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萊 蒙 托 夫

人民文學出版社

萊 藥 托 夫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四頭道胡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

書號：437·787×1092 1/32 · $\frac{9}{16}$ 印張·13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4000 定價：0.08 元

米哈伊爾·猶利耶維奇·萊蒙托夫（一八一四年十月三日〔公曆十五日〕——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公曆二十七日〕），是偉大的俄國詩人。萊蒙托夫出生在莫斯科一個退職上尉猶利·彼得羅維奇·萊蒙托夫的家裏。三歲時，萊蒙托夫失去了母親。他的童年是在邊查省塔爾漢奈村（即今邊查省別林斯基區萊蒙托夫村）他外祖母阿列克塞耶芙娜的莊園裏度過的。他接近大自然，接近淳樸的人們的日常生活，對民間歌謠、風習和儀節都非常注意。在這些年裏，他對於農奴制度下農民的痛苦生活懂得了不少，聽到過關於斯傑潘·拉辛、葉美里揚·普加喬夫的故事和傳說。所有這些，很早就萊蒙托夫的心靈中喚起了對被壓迫的人們的苦難的同情，引起了他對民衆起義的關心。在童年，萊蒙托夫曾經跟外祖母到高加索的礦泉地區去過三次。一八二七年秋，他到了莫斯科，次年進了莫斯科大學附設的貴族寄宿學校四年級。這是一所專為貴族子弟開辦的中等學校，以它的文化傳統而聞名，維護這些文化傳統的有拉伊奇·杜賓斯基、美爾茲里雅柯夫等教員。他們對於少年萊蒙托夫的文學興趣和才能的發展無疑是有過影響的。也就是在這所寄宿學校中，照萊蒙托夫自己的說法，他在一八二八年就“開始玷污詩歌”了。萊蒙托夫參加學生們所辦的手抄刊物的編寫工作；一八三〇年，“文學社”的刊物發表了他的詩“春”。萊蒙托夫學生時代最早的一些詩也是在這時期寫的，這些詩還保留

着直接摹仿普希金的痕跡（“切爾卡斯人”，一八二八年作，一八六〇年發表；“高加索的俘虜”，一八二八年作，一八五九年發表），在這時期還完成了“惡魔”一詩的初稿（一八二九年）。萊蒙托夫也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他跟索羅尼茨基和查鮑洛茨基兩人學過繪畫。他留下很多幅水彩畫和將近三百幅手法簡潔而傳神的素描（生活素描、戰地風光、人物素描、諷刺畫）。

一八三〇年秋天，萊蒙托夫進了莫斯科大學的道德政治系，當時的莫斯科大學是國內文化生活中心之一。生活在大學生的圈子裏，對於萊蒙托夫的世界觀的形成有良好的影響。和詩人同時在大學唸書的還有別林斯基、赫爾岑、奧加遼夫。在大學生的團體中，大學生們熱烈地討論着政治上和哲學上的各種問題，談論着人民的痛苦處境，談論着不久以前剛被鎮壓了的十二月黨人起義；學生們中間廣泛地傳誦着違禁的政治詩歌。赫爾岑後來回憶道：“我們堅信，從這一批大學生當中會產生一支隊伍，它將追隨佩斯特爾和雷列耶夫的足跡前進，而我們將要在這支隊伍裏面。”（赫爾岑著“往事與回憶”，一九四九年版，第六二頁）萊蒙托夫在他少年時代所寫的劇本“奇怪的人”（一八三一年作，一八五七年發表）裏面，就以高度的熱情表達了當時籠罩着學生小團體成員們的情緒——對於農奴制度的憤懣、對於壓迫農民的地主們的橫行霸道的痛恨。當萊蒙托夫寫這個劇本的時候，學生們中間正流傳着別林斯基的手抄劇本“德米特里·加里寧”，這個作品也是充滿着對於農奴制度壓迫的憤怒的抗議。在上大學的幾年中，萊蒙托夫寫了很多的詩和劇本，如“西班牙人”（一八三〇年作，一八五七年發表）、“人們和情感”（一八三〇年作，一八八〇年發表）及其他。

一八三二年夏天，萊蒙托夫幾次和反動的教授衝突以後，

就離開大學，到了彼得堡。不久以後他進了近衛軍軍官學校，在那裏度過了如他所說的“可怕的兩年”。在學校裏，主要的是軍事操練，閱讀文藝書籍是被禁止的。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萊蒙托夫還是抽空私下裏繼續從事寫作，特別是在寫一部以普加喬夫起義的時代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瓦吉姆”（一八三三——一八三四年寫作，一八七三年發表）。一八三四年畢業以後，萊蒙托夫取得了軍官職位，被派到駐在沙皇村的近衛軍驃騎兵團。一八三五年，“讀書文庫”雜誌上登出了他的“哈奇·阿布列克”一詩（係他人代投稿，作者本人事先並不知道）。在這以後，萊蒙托夫又寫了詩篇“大貴族奧爾夏”（一八三五年作，一八四二年發表），劇本“假面舞會”（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年作，一八四二年發表）；他曾嘗試使這個劇本通過審查上演，但是沒有成功；他又和另一位詩人拉耶夫斯基合作寫了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公爵夫人里戈夫斯卡雅”（一八三六年寫作，一八八二年發表），還寫了詩篇“鮑羅金諾”（一八三七七年）。萊蒙托夫逐漸進入了彼得堡的文學界。

普希金逝世後的那幾天，萊蒙托夫的生活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就像赫爾岑所說的，“殺害普希金的那聲槍響，驚醒了萊蒙托夫的靈魂”（“赫爾岑選集”，一九三七年版，第四〇四頁）。為偉大的人民詩人的死所震撼，萊蒙托夫寫了表達出當時所有先進人們的感觸的詩篇。拿當時一個人的話來說，“在俄國，幾乎從來還沒有一首詩產生過這樣巨大而普遍的印象”。“詩人之死”這首詩被抄成許多份，傳播到全國各地。青年詩人嚴厲地、直言不諱地揭發了宮廷權貴和沙皇本人，指明他們就是剛剛發生的悲劇的真正兇手。他預言那幫絞殺自由的劊子手權臣將遭到應有的報復：“你們用你們所有的黑血，也沖洗不掉詩人正義的血痕。”當這首大膽的詩篇傳進皇宮，萊蒙托夫立刻就

捕了。在審訊的時候，他並不否認這首詩是他寫的，並且在談到他的詩時這樣寫道：“背棄它……那我不能夠：真理永遠對於我是神聖的。”按照“聖旨”，萊蒙托夫被流放到尼席戈羅德龍騎兵團，這支隊伍當時駐紮在高加索，正參加對山民的戰爭。在去團隊的途中，萊蒙托夫在畢吉戈爾斯克停留了一些時候，到過斯達夫羅波里。這時期，他結識了很多從西伯利亞調到那裏被貶為普通士兵的十二月黨人；他和詩人奧陀耶夫斯基、納濟莫夫，後來又和李哈列夫特別要好。萊蒙托夫在高加索會見十二月黨人時，他對於文學及社會問題所持的那些激烈而尖銳的看法，使得十二月黨人大為吃驚。萊蒙托夫在高加索結識的人裏面，還應該提到麥耶爾醫生（“公爵小姐梅利”中的維涅爾醫生就是借用他的形象），他是一個仇恨專制制度、抱有激進觀點的人。在梯弗里斯的短期逗留，使萊蒙托夫得以接近當地知識分子中最優秀的人物；很多可靠的材料都證明：他曾經和卓越的格魯吉亞詩人查夫查瓦捷及他的女兒格里波耶多娃有過往來，也和詩人奧爾貝利安尼、巴拉塔什維里，以及阿塞拜疆學者、詩人阿洪多夫有過往來。萊蒙托夫研究阿塞拜疆語言。當他在高加索漫遊的時候，他對於山地各族人民的口傳詩歌非常感興趣，並且記錄了阿塞拜疆童話“阿希克—凱立布”（一八三七年作，一八四六年發表）。這一切，都豐富了萊蒙托夫的創作，鮮明地表現在他從流放地返回以前（一八三八—一八四一年）所寫的一些成熟的詩篇中，如：“逃亡者”（一八四六年發表）、“童僧”（一八四〇年發表）、“惡魔”（一八四二年發表斷片，一八五六年全部發表）。在高加索逗留的時期，萊蒙托夫創作了他的大部分繪畫作品，主要是風景畫。在他的水彩畫和素描中，可以看出一個能夠準確地分辨那最重要最典型事物的藝術家在結構方面的高度熟練性和敏銳的觀察力。在後

來萊蒙托夫和畫家加加林合作的一些戰爭圖畫中也有這些特點，在這些圖畫中，高加索戰事的一些情節被真實地描畫出來了。

由於阿爾謝尼耶娃和詩人茹科夫斯基不斷的懇求，萊蒙托夫終於從高加索調到駐紮在諾夫戈羅德附近的格羅德寧驃騎兵團。一八三八年四月，他被允許回到首都，進了近衛軍驃騎兵團。俄國社會上的先進人士現在已公認萊蒙托夫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是普希金的直接繼承者和果戈理的戰友。一八三八年報紙上發表了（作者未署名）“沙皇華西列維奇、年輕的親兵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這首詩受到別林斯基熱烈的讚賞。一八三九年，別林斯基讀過萊蒙托夫的新詩作，包括“三棵棕樹”以後，寫信給斯丹凱維奇說：“俄國出現了新的強有力的天才。”（別林斯基：“書信集”，第一卷，一九一四年版，第三三九頁）這位偉大的批評家在給鮑特金的信裏提到“捷烈克河”和“哥薩克搖籃曲”兩首詩時說：“說來很可怕，我感到，這個青年人將要成為俄國第三位詩人，我感到，普希金死了並不是無後繼的。”（同上，第二卷，第三一頁）詩人對於貴族社會的反感一年比一年增強起來；他看到了這個社會的敗行，越來越深地認為，農奴制度俄國的社會政治結構是與一切進步傾向為敵的。萊蒙托夫在這個時期所寫的詩（“沉思”，一八三九年，“詩人”，一八三九年，“又寂寞又悲傷……”，一八四〇年，及其他），反映了他對於政治反動情況下先進人們的無所作爲對於渴望活動、渴望對充滿敵意的環境作鬥爭的熱愛自由的人的悲慘的孤獨所感到的苦惱思慮。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間，“祖國紀事”雜誌連載了“當代英雄”這部長篇小說的分章。一八四〇年這部小說出版了單行本。不久以後，又出版了萊蒙托夫的第一部詩集（一八四〇年）。這兩本書都得到別林斯基很高

的評價，他在好幾篇批評論文和書評中，對萊蒙托夫的創作作了深刻的闡釋。

一八四〇年二月，萊蒙托夫和法國駐彼得堡大使的兒子巴蘭特發生口角，舉行決鬥；爭吵的起因是爭論俄國人的民族成就。這個事件其實是圍繞着萊蒙托夫展開的政治鬥爭的表現，它被沙皇政府利用來作為懲治這位危險的詩人的口實。這次懲治勾當的主使人之一就是巴蘭特大使，他和曾經設計陷害並謀殺了普希金的憲兵隊長班肯道爾夫及外交部長涅謝爾羅德勾結起來進行。雖然萊蒙托夫只不過犯了微不足道的過失，可是軍事法庭奉行着沙皇的直接指示，判處他第二次流放到高加索。現在蘇聯研究家已經確切斷定：尼古拉一世曾親自指定流放地點為泰庚步兵團，這個步兵團正準備進行艱難而危險的戰鬥；在尼古拉一世寫給他妻子的一封信裏有這樣一句惡毒的話：“萊蒙托夫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一八四〇年夏，萊蒙托夫不得已參與了高加索的戰事。他在戰鬥中表現得異常英勇，曾兩次被提請嘉獎；但是嘉獎是可以減輕他的罪名的，因此沙皇堅持拒絕一切申請。一八四一年二月初萊蒙托夫獲得了短期的休假，回到彼得堡，他一心希望留在首都，以便把自己一切貢獻給文學事業。但這個希望沒有能實現。被當權者所迫害，又不得不聽那些令人屈辱的責難，蒙羞忍辱的詩人費了好大力氣才得到允許在彼得堡住了將近三個月。在這期間，他曾為出版他修改過七次的長詩“惡魔”奔走，和作家們來往，到過經常登載他的詩的“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計劃過自己辦一個雜誌，會見過別林斯基，別林斯基早就器重萊蒙托夫，並對他寄以很大的希望（在萊蒙托夫第二次被流放以前，別林斯基曾到獄中探望萊蒙托夫，詩人和批評家因此格外接近起來了）。新的、豐富的文學構思在萊蒙托夫心中

成熟了。別林斯基說：“在他那倦於生活的無謂奔忙的頭腦中，已經開始了成熟的創作；他親自告訴我們說，他有意要寫一個長篇小說形式的三部曲——三部長篇小說，描寫俄國社會的彼此有聯系和有某種一致性的三個時代（葉卡特林娜二世時代、亞歷山大一世時代和當代）……。”（“別林斯基全集”，第六卷，一九〇三年，第三一六頁）

一八四一年四月，萊蒙托夫接到命令，限他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彼得堡，返回高加索的團隊。路上他寫信給他的一個熟人道：“祝我幸運並且受到輕傷吧！這是能為我祝禱的最好的事。”在旅行期間和在這以後的時期中，萊蒙托夫的創作力異乎尋常地高漲起來。這一點可以拿他所寫的許多詩來證明：“懸岩”、“爭辯”、“夢”、“幽會”、“海上公主”、“先知”、“一片橡樹葉子離開了親密的樹枝”、“我獨自上了路”，這些詩篇都屬於俄國抒情詩最完美的典範之列。

在歸隊途中，萊蒙托夫在畢吉戈爾斯克停留下來療養。聚集在溫泉地方的貴族社會，所謂“黃金少年”的代表者，很知道宮廷方面是怎樣對付萊蒙托夫的；他們對詩人的敵意，由於懼怕他那鋒利的言詞和嫉妬他的聲譽而更加熾烈。於是在萊蒙托夫的四周，議論紛紛、造謠中傷、仇恨憎惡的氣氛越來越濃厚了。終於，在與班肯道爾夫有聯系的憲兵隊軍官的祕密策劃之下，有意製造了一場爭端，接着就發生了萊蒙托夫和軍官馬爾廷諾夫之間的決鬥，結果詩人慘遭殺害。在蘇維埃時代，把這次決鬥的情形通盤加以縝密的研究以後，證明這是反動政權的僕從們的蓄意謀殺。詩人的一個同時代人所說的話是人所共知的：“假如他沒有被馬爾廷諾夫殺害，那末他一定會被另外一個什麼人殺害。”第一個評定萊蒙托夫的價值的別林斯基，在“祖國紀事”雜誌（一八四一年，第九期）中寫道：“不幸的俄國文

學，又蒙受了一次新的、巨大的損失。”高爾基談到萊蒙托夫時說：他“整個的人，就是一首沒有唱完的歌”。

充滿着公民熱情和愛國主義感情的萊蒙托夫的詩，產生在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基礎乃是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在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中達到頂峯的俄國解放運動的高漲，引起了祖國文學的高度繁榮。在克雷洛夫、普希金、格里包耶陀夫的詩中，可以找到當時俄國社會現實生活基本過程的反映。萊蒙托夫是作為前一個文學時代光榮傳統的後繼者而出現的。他直接追隨着普希金的足跡，成為俄國社會上尋求解放的意志的喉舌，成為賦與俄國文學以崇高的公民理想的作家之一。

萊蒙托夫屬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起義以後出現的偉大俄國活動家之列。以赫爾岑為首的新的一代貴族革命者，極力想在十二月黨人運動以後的反動局勢下繼續他們先驅的事業。作為赫爾岑、奧加遼夫、別林斯基的同時代人，萊蒙托夫就成了他們的希望和意向的歌唱者和表達者。赫爾岑曾寫道：“他完完全全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我們當時都還太年幼，不能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義。而當我們被這個偉大的日子喚醒的時候，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死刑和流放。我們被迫緘默不語，只得忍住眼淚，學會了一味沉思，學會了隱藏我們的思想——而這是些什麼樣的思想啊！……這是懷疑、否定、心懷叵測的思想。由於慣常有這樣一些感覺，萊蒙托夫不能在抒情詩裏找到解脫……剛毅的、陰鬱的念頭從來沒有離過他的額頭……”（“赫爾岑選集”，一九三七年版，第四〇五頁）置身於一個殘暴的政治反動時代，萊蒙托夫在初次寫詩時就表現為一位公民詩人，充滿着對於暴虐無道和專橫統治的憎恨以及對於在暗無天日的世界上受苦的人的同情。他的早期的抒情詩中充滿着對於

自由的渴望，充滿着喚起行動、喚起鬥爭的號召（“土耳其人的哀怨”，一八二九年作，一八六二年發表；“獨白”，一八二九年作，一八五九年發表）。在他少年時代的詩篇和戲劇中，他苦惱地反覆思索着自己的使命，思索着自己無力投入活生生的事業，他夢想建立功勳。他繼承了十二月黨人詩人的傳統，探索俄國往昔的歷史，歌頌爭取自由的人民鬥爭中的英雄們（“最後的自由之子”，一八三〇年作，一九一〇年發表；關於牟斯奇斯拉夫的幾篇詩草，一八三一年作，一八八二年發表）。當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曾引起這位青年詩人的密切關懷。由於一八三〇年霍亂流行而引起的農民騷動，使萊蒙托夫預言，總有一天，“沙皇的皇冠會落下來”。西歐的革命運動激起了他的熱烈響應，他特別為一八三〇年法國的七月革命和皇帝卡爾十世的推翻寫了詩。無論萊蒙托夫寫什麼，在他的詩裏面總融合有愛國主義思想和要求政治自由的思想。他早期的許多“高加索”詩也是如此；在這些詩中，浪漫主義色彩、對於具有剛強性格的高傲不屈的人們的描寫，是和宣揚愛自由、和史實般真實地敘述高加索的戰事交織在一起的（“伊茲邁伊爾·貝”，一八三二年作，一八四三年發表，及其他）。

雖然萊蒙托夫是俄國最大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但他同時也發展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他正是循着現實主義道路進行着堅持不渝的藝術探索。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對於現實生活的浪漫主義的感受，是和廣泛地運用實際生活素材、經常想要從具體的歷史現象來認識世界的願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在萊蒙托夫的詩中，浪漫主義題材的體現不是出於醉心異國情調，也不是為了僅僅皮相地描寫民族風尚（像許多西歐浪漫派作家那樣），而是出於一種想要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實際生活、發掘民族性格特點的願望。

還在少年時代，萊蒙托夫就決定要寫一個年輕的僧人在鬱悶的修道院禪房中受苦的故事。在早期的詩“懺悔”（一八三〇年作，一八五九年發表）中，他描寫一個西班牙的隱士，獨自一人談述着自由。同一個主題也出現在“大貴族奧爾沙”一詩（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年作，一八四二年發表）中，這首詩已經包含着對於社會上的不公平和教會的偽善法規的抗議。但是最完善而在社會意義上最尖銳地體現了這一主題的要算“童僧”（一八四〇年），在這首詩裏面，萊蒙托夫廣泛地利用了他流放期間所搜集到的高加索的實際材料。在這裏，他拋開了假想的西班牙人形象，拋開了古代的題材（“大貴族奧爾沙”），而用當時典型的高加索生活的主題，作為“童僧”一詩的基礎，那就是：一個年輕的山民，豪放不羈的意志的化身，被沙皇的將軍俘擄並囚禁在修道院裏。萊蒙托夫對於自由的熱望和對於祖國的思念又一次流露出來，並且變成了反對暴君制度、反對尼古拉統治下窒息氣氛的抗議。萊蒙托夫以關於格魯吉亞的歷史命運的思想、大自然景色的描繪、民間傳說和民間歌謠的曲調豐富了這首詩——他長期的構思的定稿（試比較“童僧”中搏鬥的一場和盧斯達維里的“虎皮武士”一詩中相似的情節）。

萊蒙托夫終生從事寫作（自一八二九年起的“惡魔”的構思，和“童僧”的情形正好一樣，也是隨着年代而改變的。故事發生的地點在不斷改變；情節的細微末節在不斷改變；浪漫主義的假想的情境讓位給活生生的真實的圖景，而每改寫一次詩稿，作者的主導思想也就變得更加明確起來——他是想創造一個體現着對自由的渴望、體現着反抗和否定的感情的人物形象。萊蒙托夫時代的先進人們，首先是別林斯基，正是這樣來理解“惡魔”的含義的。安年科夫證明，別林斯基在這首詩中看到了“對於人類自由權的熱烈維護”，“惡魔”是萊蒙托夫最重要

的作品之一，因為它體現了萊蒙托夫內心深處所珍藏的叛逆思想。那個貫穿着萊蒙托夫全部詩作的叛逆者的形象，至這裏被賦與了天神的性徵。在解釋這個形象時，首要的東西是對於上天的“傲慢的敵意”，對於知識和自由的渴望，其次才是世界文學中這個形象的許多前輩們所具有的虛幻的成分。在萊蒙托夫的惡魔雖然有着巨大的內在力量，但却處在悲慘的無爲的狀態中，他雖然有想戰勝孤獨、接近善良的願望，但是却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種戲劇性的衝突的實際基礎就是：詩人生活在一個新的解放運動階段以前的過渡時代，還看不到在爭取人類解放的鬥爭中所能依靠的社會力量，他迫切地要找到一條脫離孤獨處境的出路。因為在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以後，先進的人們還沒有找到新的鬥爭形式，還不知道走向人民的道路。

這一類的思想和感情經常控制着萊蒙托夫。在他的常常像抒情日記一樣的早期詩作裏，政治的調子就已經很響亮。隨着歲月的增長，社會生活也越來越強烈地深入他的詩的天地；當代的各種大問題、關於整整一代人的命運的思慮、關於社會現狀的思慮，佔着首要地位。在成年時代的創作中，萊蒙托夫表現爲一位自覺地反對貴族農奴制度社會的政論詩人。在“詩人之死”（一八三七年作，一八五六年發表）這首詩裏，他起而反對尼古拉的帝國的統治集團。在“沉思”中，他申斥社會的消極，責備他那些對於“善惡”無動於衷的同輩們的無所作爲。在“我常常被紅紅綠綠的一羣人包圍着”一詩中，詩人咒詛貴族人羣，把“注滿了悲痛與憎恨的鐵的詩句”對準他們的眼睛投去。在劇本“假面舞會”（俄國戲劇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中，他大膽地揭穿了彼得堡“世界”的腐敗潰瘍。在“詩人”一詩中，萊蒙托夫宣佈了公民詩歌的崇高理想，這種詩歌應當燃起“戰士的戰鬥之心”。萊蒙托夫的抗議常常蒙上了一層陰暗的、悲觀的色調，不

過他這種充滿着內在力量的悲觀情緒，和對於生活的抽象的絕望毫無相同之處；高爾基曾肯定地說過，萊蒙托夫永遠面對着人間社會，他具有積極的性格。萊蒙托夫的懷疑精神，他在否定尼古拉統治下的現實這方面的不妥協精神，原是由對於自由和公理的深切渴望引起的。在和詩人的私人交往中，目光敏銳的別林斯基從他對於生活的憤恨的冷淡的觀點中看出了對於人類成就及對於未來所懷的“深刻信念的種籽”。這種信念，支持着萊蒙托夫勇於揭發的熱情，給他灌輸了人道主義詩人和自由謳歌者的熱忱。萊蒙托夫從來不是一個鼓吹妥協和軟弱的人。至於他詩中的憂鬱淒涼的意味，那只是社會壓迫的結果，是由於痛苦地想到個人在充滿奴役和壓迫的世界上的苦楚而產生的。和這種鬱鬱不樂同時，萊蒙托夫還強烈地表現出人對幸福的嚮往（“童僧”），戰勝孤獨、尋求和人民打成一片的途徑的願望。萊蒙托夫在他的飽含人性的抒情詩中斥責戰爭（“我寫信給您……”，一八四〇年作，一八四三年發表），歌頌愛情和友誼，真情動人地敘述在兒子搖籃邊歌唱的哥薩克母親，創造了淳樸忠誠的俄羅斯士兵的形象（“鮑羅金諾”、“馬克辛·馬克辛梅奇”，一八四〇年；“遺囑”，一八四一年），這些人們心靈的純潔和“上流”社會人們的道德敗壞恰成對比。萊蒙托夫“對於人們和另一種生活的驕傲的信念”也體現在“紀念奧多耶夫斯基”（一八三九年）一詩中。

在萊蒙托夫的創作中，現實主義基礎始終不斷在加深。在早期的長篇歷史小說“瓦吉姆”中，作者用浪漫主義的手法強調地描寫了書中的主要人物，但同時也真實地描寫了農民的起義，並且企圖創造現實主義的人們形象及傳達出民間言語。早期的“鮑羅金諾戰場”（一八三一年作，一八六〇年發表）原是以浪漫主義的誇張手法寫的，但在當時就已充滿了強烈的愛國

主義感情；而到了成年期，這首詩就變成了（在“鮑羅金諾”一詩中）一篇描述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戰役、描述俄國戰士的豪勇和他們對祖國的忠誠的富於深刻的現實主義色彩的民間故事。“沙皇伊凡·華西列維奇……之歌”是以民間口頭創作為源泉、以傳說和歷史歌謠為基礎而產生出來的，在這首詩中，萊蒙托夫描繪了古代的嚴峻的風尚，刻畫了伊凡四世的威嚴形象（就像別林斯基所形容的，“簡直和銅雕的一樣”），還刻畫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這個充滿戲劇性力量的人物。在這首詩中，一個人為自己的權利、獨立和尊嚴而鬥爭的主題，表現得非常有力；而這一個主題對於萊蒙托夫說來就是典型的主題。

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萊蒙托夫擺脫了那些曾經束縛了他的早期作品的浪漫主義的公式，像他自己所說的，克服了它們那“虛偽的矯飾”和“震耳欲聾的語句”。在“編輯、讀者和作家”一詩（一八四〇年）中，萊蒙托夫肯定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綱領，這種文學應當具有“樸素的語言和情感的高尚呼聲”。萊蒙托夫遵循着這一原則，採用當代的題材，接連不斷地創造出繼承普希金的現實主義傳統的散文作品和詩作。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公爵夫人里戈夫斯卡雅”（一八三六一一三八年作，一八八二年發表）以風格的樸實和明晰見長，在這部小說中，萊蒙托夫寫了一個和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中的主人公們相類似的窮苦的小官員，並且嘗試着要暴露大都市的社會矛盾。真實地描寫內地生活的有詩體中篇小說“坦波夫的司庫員之妻”（一八三八年），它以諷刺的筆調刻畫了貴族官僚社會的貧乏，還有現實主義的詩“薩什卡”（一八三九年作，一八六二年發表）及其他。萊蒙托夫的抒情詩中現實主義的頂點是“祖國”（一八四一年），從這首詩裏面可以看出，詩人的思想已經轉向人民，轉向農民的俄國。在思想發展上，萊蒙托夫超過了十二月黨人。按照杜

勃羅留波夫的意見，他已經懂得“要避免……走錯路，只有走向人民”這個道理，並且以“祖國”一詩的驚人詩句證明了這一點。革命民主主義的批評家很高地評價萊蒙托夫的反抗精神的抒情詩，很高地評價這位詩人，因為他“真正地、神聖地、理智地理解對祖國的愛”（“杜勃羅留波夫全集”，第一卷，一九三四年版，第二三八頁）。

萊蒙托夫的現實主義的真正成功是長篇小說“當代英雄”，這是一部充滿了深刻的社會內容的作品，對於俄國和世界散文的進一步發展起有巨大的作用。在這部小說中，萊蒙托夫表現為一位心理現實主義的大師；他在揭發人的內心世界這方面的成就，以後被列夫·托爾斯泰承受了下來。萊蒙托夫繼續着從“沉思”一詩開始的思想路線，創造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一個富有思想的人的典範。在當時的社會生活的廣闊背景上烘托出來的畢喬林，是一個具有堅強而活躍的性格的人，他有鋒利的智慧，渴望把自己“無窮無盡的精力”投到生氣勃勃的事業中去。但是沉重的停滯的時代却在他身上印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作者無情地揭發了存在於他的主人公身上的“深厚的天性和卑微的行為之間的矛盾”（別林斯基語），顯示出他怎樣一無所成地耗費了他的精力。萊蒙托夫譴責畢喬林的自我中心主義，他對人們的漠不關心，在小說中用馬克辛·馬克辛梅奇的人道精神和質樸的智慧、用貝拉的純潔的愛情和梅利的真摯的感情來作對照。不過萊蒙托夫也了解，畢喬林的缺點是過渡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在那個時代，優秀的人們看不到、而且也不能看到他們在反抗中所應依靠的那個革命力量。萊蒙托夫也表明了他的主人公勝過環境的地方，這首先表現在畢喬林自己意識到自己的缺點，並且真心責備這些缺點。決定了這部小說的社會意義的強有力的方面，就是尖銳地暴露了畢喬林深刻

的精神的及社會的悲劇，站在創作發展新階段門檻上的萊蒙托夫在思想上及藝術上的成熟性，表現在這部小說的高度藝術成就上：結構的完整，人物性格的細緻的心理刻畫，無比精練純淨、含有高度現實主義詩意的語言；那些把萊蒙托夫看成老師的偉大俄國作家們——托爾斯泰、契訶夫——對於萊蒙托夫的語言都備加讚揚。

正當才華極盛的時候，萊蒙托夫的艱苦的短短的一生突然中斷了。偉大的反抗的詩人僅僅看到了那和別林斯基的名字分不開的社會運動的開端，而他曾經參加這個運動。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曾指出，萊蒙托夫滿懷同情地“贊成新的傾向，但只因爲他生活的最後時光是在高加索度過的，他才不能參加別林斯基和他的友人們的友好談話”（“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三卷，一九四七年版，第二二三頁）。萊蒙托夫完成了俄國詩歌上的貴族革命時期，他的創作是在這一新思潮中發展起來的，並且給六十年代民主文學的繁榮作了準備。萊蒙托夫詩作的意義，在於它回答了俄國解放運動的迫切要求，鼓舞了許多代的革命鬥士和以後幾十年間的先進文學。向萊蒙托夫學習的有四十年代先進團體——彼得拉舍夫派*的詩人們，從萊蒙托夫一脈相承的有涅克拉索夫的人民愛國抒情詩，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散文。年輕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崇拜萊蒙托夫和果戈理，他在日記裏寫道，他“甘願爲他們獻出生命和榮譽”。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世界觀是在萊蒙托夫詩歌的影響下形成的。他的詩歌對於俄國許多民族的文學也有很大的影響；卓越的詩人如澤

* 彼得拉舍夫派是一八四五——一八四九年在彼得堡活動的先進俄國知識分子小團體的成員。這個團體的組織者之一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一八一——一八六六年），其社會、政治及經濟綱領的基礎是要求消滅封建農奴制度。——譯者